

书人茶话

2024年,读几本“冷门”历史佳作

■ 唐山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确理解这句话的人不多:一些人误以为,关乎“兴替”的才是历史,无视“小历史”中的大智慧,忽略了历史经验的丰富性;另一些人则误以为,逻辑完整、有头有尾、令人慷慨激昂的才是历史,沉迷于故事,忽略了历史经验的深度性。

人类思维有天然短板,易将“故事”当成“事实”,不自觉地将偏见、误会、自以为是为等合法化。太多“大文章”建构在“误读+架空”的规律之上,无非“六经注我”。

因此读史有时是一个步步惊心的过程,须警惕虚假的“因为……所以”。好的历史书会时时提醒读者,使人审慎,但这种体现专业性、责任感的好书,常被讥为“难读”“故事性不强”,成了“冷门”书。

所幸读者的认识总在进阶,真诚之作终会替代虚假之作。与其明日追读,不如当下读起。2024年,至少这四本略显“冷门”的历史书,我们不应错过。

王安石为什么爱“抬杠”

若王安石自称第二“杠头”,无人敢认第一。司马光称他“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朱熹称他“直是强辩,鄙视一世”。

北宋重“异论相搅”,言论环境宽松。王安石多次面刺宋神宗“不明于帝王大略”,宋神宗不以之为忤。可奇怪的是,宽容既未推进政治文明,亦未实现富国强兵,反致朝堂上意见激烈对立、党争不已,事议以而不决。

王安石问大、脑子快、善驳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时,只用一年便将耿直的同僚唐介气死(或许这是南宋人编的段子),主政后,常令司马光等哑口无言。

王安石的辩论技巧不复杂:一是气场强,自信绝对正确。二是多谈大原则,忽略细节。宋神宗集虑于“盗贼增多”,王安石立刻反驳,尧舜治天下,也有盗贼。三是动辄人身攻击,谁质疑疑法,谁就是“小人”“奸臣”。

王安石屡屡在嘴上取胜,因时人不讲逻辑,建言皆来自古书,王安石能一口气列出数条记载,搞“文史轰炸”,别人用此法反驳,王安石能迅速找到漏洞,展开反击。

互掉书本本是最低级的论辩术,新信息不等于新证据,一万条与一条无别。读《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一书,每每扼腕:千载前亚里士多德已创形式逻辑,为何智慧如王安石等,连基础水平都达不到?或因古希臘议论面对大众,需说服万人,倒逼议论工具走向成熟;而宋人只面对皇帝一人,投其所好即可,讲逻辑太迂阔。

王安石被重用,因宋神宗也“好辩”,喜当庭驳难,令臣子窘迫,王安石则随时能接上话。王安石、宋神宗都在“虚拟环境”中长大,前者以会读书、会考试而成功,后者以好学、有进取心而上位,这扭曲了他们的现实感,他们会因一句经典错引而愤怒,对百姓挨饿却无感。他们心有灵犀,却未必是众生之福。

北宋的宽容之风,系于皇帝的个人修养,而非权力约束,在此脆弱基础上,王安石虽人格高尚,也难被长久信任,变法失败早已注定。时代困局中,北宋士大夫多“强辩”,只是王安石独背污名。可惜一番挣扎后,王安石式辩论术仍在,但集体理性未得寸进,历史反而陷入停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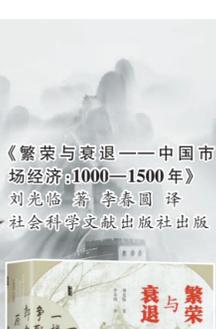
《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周思成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美]菲利普·莱曼著 赵昱辉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报道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美]芭比·泽利泽著 白红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刘允尧、李春圆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史反而陷入停滞。

本书体量虽小,感慨却深,唯有愿者能得之。

科技能拯救世界吗

“要么西方衰落,要么亚特兰特罗帕成为转折点和新目标。”这是德国建筑奇才赫尔曼·索尔格勒的名言。他提出了疯狂的“亚特兰特罗帕计划”:在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建大坝,把地中海变成陆地,使德国得以扩张,“西方文明”获得新生。

该计划源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工程师鲁代雷提出的“撒哈拉海计划”:引海水淹没撒哈拉沙漠,改善地球气候。鲁代雷不是气候学家,对沙漠了解甚少,但他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他的技术是:沙漠有害;不治理,沙漠会入侵欧洲;到那时,想治理已来不及;靠科技拯救世界。

欧洲推进现代化的话术是:传统有害;推翻传统,才能进步;落后了,就再难追上;靠科技摆脱落后。鲁代雷抄袭了这种现代化话术,这种话术屏蔽多种因素,将复杂世界简单化,只为激起人们的参与意识。

“撒哈拉海计划”漏洞百出,地中海周边地势高,海水根本无法注入撒哈拉沙漠。但在鲁代雷忽悠起的焦虑感下,越无法实现,人们越愤怒,反而热衷于提出更大、更“彻底”的终极解决方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有类似计划被提出、被尝试。

《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一书作者菲利普·莱曼指出,鲁代雷、索尔格勒的最大偏颇,在于试图用工程思维解决系统问题。面对复杂世界,工程思维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制造出另一个问题,将人们陷身其中,永无宁日。要解决系统问题,只能采取系统思维。然而,系统思维太慢、太绕远,工程思维却给人以虚幻的掌控感。工程师们提出越来越“大胆”的计划,到后来,除非依靠强权,才有可能实现。索尔格勒于1928年加入纳粹,后任希姆莱的副官,以“造福人类”为名,最终变成“人类之敌”。

鲁代雷、索尔格勒等已作古,但工程思维仍在,它潜伏在现代生活的诸多细节中,比如广告里,家庭主妇因厨房污秽而崩溃;代言去污剂的人从天而降,一挥,一切洁净;家庭主妇快

乐地奔跑在草地上……

这种“危机出现一迅速解决一生活变好”仍是“现代迷信”的话术,它暗示“只要找到办法,问题瞬间解决”。如人类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撒哈拉海计划”只会一次次卷土重来。

阴谋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多位记者因及时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其背后却是天大的笑话:刺杀发生时,记者们都在媒体报道车内,距肯尼迪数十米,无人留下一手信息,唯一一段模糊影像出自路过的一位路人,不是记者。

很多记者没听到枪声,却写出“现场报道”。输给业余的札普鲁德,他们很不爽,强烈要求集体采访刺客奥斯瓦尔德,监狱方被迫同意。两天后,采访现场挤满笨重的摄像机、电缆,四处乱哄哄,杰克·鲁比混了进去,枪杀了奥斯瓦尔德。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反省他们造成了奥斯瓦尔德的死亡,反而欢呼:这是“人类首次被直播的凶杀案”,标志着电视采访从此成为王者。

第一时间没出现在现场,写出来的只能算假新闻,但那些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记者们“专业”地掩盖了这场致命缺陷。掩盖技术包括采访在场的普通人、做新闻的第二落点等,此外,每逢肯尼迪遇刺周年,媒体都大加炒作,一次次邀请不在现场却写出报道的“名记者”“回忆”过去。为了让持续炒作更具吸引力,一位“刺杀现场的记者”突然提出阴谋论,而他在一年前还认为此说太荒唐。

阴谋论是一口挖不干的井,它成功引起大众的好奇,带来滔天流量。到肯尼迪去世20周年纪念日,阴谋论已成主流。与此同时,媒体上肯尼迪的形象越来越好,没人再提他堕落的生活方式、日常蠢行等,肯尼迪成了“完美的受害者”。

新闻追求真相。可现实是,谁擅长传播,谁反而会被视为“专家”。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遇刺新闻的集体谎言并非串谋的产物,初期只是记者们为掩盖失职,进而是为追求流量,而随着大众信以为真,他们已无力澄清真相。《报道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引人思考:现实中还有多少类似的谎言?人们该怎样摆脱谎言的包围?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这是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提出的观点。

宋代经济繁荣有目共睹,颇多学者认为,它已进入“近世国家”,远超欧洲同期水准,与17世纪前现代国家比,亦不遑多让。这自然引发疑问:宋代遥遥领先,为何中国却未能率先跨过现代化门槛?

《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提出独家见解:随着宋亡,元代和明初转向用管制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引发长达200余年的衰退,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丧失先机,留下永远遗憾。

作者认为,元明逆市场化体现在四方面:一是禁民自由迁徙;二是发行纸币,管控物价,取消了货币的独立性;三是在经济活动中去货币化;四是抄没私人土地,严控兼并,大规模强制移民和田田。

元明如此操作,有其长远考虑:商品经济拉大贫富差距,随着土地兼并,可能引发饥荒。既然无法自动均平,政府就站出来,强制均平。可结果却适得其反:1080年(宋)时,人均粮食收入7.5石,白银收入7.5两;到1400年(明)时,人均粮食收入降至3.8石,白银收入0.73—0.95两。宋朝农民的户均贸易量是明初农民的7—10倍。

明初农民的收入只有宋朝的一半,纳税比重却增一倍。为养活自己,“不得不”在缺乏农具的情况下耕种近100亩的土地,全国亩产降至极低水平,经济向粗放型农业倒退。

国力被削弱,人民更穷,饥荒频繁……元明的误操作导致“三败”,这是因为,古人没意识到市场经济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只有社会繁荣,才能拥有一切。基于架空的责任感和直线思维,只能带来灾难。尊重客观规律,包括市场规律,就能确保公平、正义与秩序;不尊重客观规律,只会造成文明倒退,人人皆成受害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500年兴衰的教训刻骨铭心,值得后人牢记。

本书论扎实,在数据搜集、研判和选取上不遗余力,全书一半以上是注释,可谓针脚绵密,不发空言。



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

《范文澜读本》导言

■ 陈思和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关于范文澜的印象,可以追溯到1978年我上大学的头一年。那时候读书风气蔚然,老师们口中流传着一副对联,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那是老师们谆谆教导我们要把它作为座右铭的。相传这副对联是范文澜先生所写。为此我曾去查过范文澜的著述讲演和其他材料,只查到范先生有“二冷”的说法: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头肉。好像不是讲严谨治学的意思,而是鼓励学者要自信,要耐得住寂寞,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会被以后的人们所承认,配得上古代大儒享用人们的祭祀。“吃冷猪头肉”之说多少含有一点自我嘲讽,但自嘲背后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孤傲,确是大学者的傲世风骨。这“二冷”的说法对我的影响更大,也更强烈。然而那副流传人口,被我们当作座右铭的对联,未必是范文澜所作。奇怪的是,那时我们都相信对联是出自范文澜之手。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与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的建构的范文澜的形象有关。在那个时代,甘于坐冷板凳、潜心做扎实学问,这样的榜样,非范文澜先生莫属。

范文澜的形象,不是通过社会新闻,或者坊间八卦塑造起来的;他的名字是与他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以及修订本《中国通史》前四册联系在一起,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刻印象。我初读范著通史的时间比上大学还早几年,上世纪70年代,家里藏有一本《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一册,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读物,繁体字竖排本,只讲到先秦时代。这本书里有个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按照那时的通行说法,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春秋时期,依据是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左传》记载的“初税亩”。郭沫若持这个观点。范文澜也注意到“初税亩”标志着土地私有合法化的问题,但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更加广泛一点,他把土地所有制、农民私有经济的形成以及西周上层建筑实行分封制等方面综合起来考察,推测是古代农业生产力的不平衡,决定了先进与腐朽的社会制度冲突,周武王伐商,代表了先进的封建社会制度战胜腐朽的奴隶社会制度,他倾向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西周初期的说法。据说这个观点是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先生提出来的,范文澜支持了“西周封建说”,并以历史学家的深邃学识,把它写进中国通史,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观点。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特殊时期,主流观点又回到了“春秋封建说”。本来作为学术争鸣,古代史历史分期学说纷纭,远不止楚汉两家,也没有什么足以一锤定音的新材料,争来争去都属于正常,但是学术一旦过度政治解读,就有点不正常了。范文澜在1969年患心脏病去世,之后他的“西周封建说”以及褒扬儒家的史学观点没有受到公开批判,但是有关“范老是否尊孔派”“中国通史重写”之类的风声一直不绝于耳。我就是在那个风声雨声中阅读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范文澜正气凛然,如砥如柱的历史叙事,立场观点鲜明,文辞朗朗上口。这是我阅读的第一种中国历史著作,一下子就迷进去了。后来陆续买到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第六、七、八、九、十册,还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我都认真读过。说实话,对范文澜的学术观点我不一定赞同,尤其是他对佛教文化、对曾国藩的斥责和批判,我觉得过于情绪化了,但我还是喜欢读他那种爱憎分明的叙述文字。我感受到,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传统读书人进入现代革命时代,所力求表现的炽热真诚。

范文澜一生走了两条道路。早年他追随名师,传承国学,经史子集均有研究,而且写得一手好古文。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进入北京大学,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大师,与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同列青年才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风云际会,成为一时潮流,范文澜不为所动,甚至怀疑他的同乡鲁迅是否走错了路;但是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帝意识促使了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他一边埋首治学,著书立说,盛誉士林;一边逐步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其间还两度被捕入狱,尝到了铁窗滋味。抗战爆发,范文澜义无反顾投入社会实际工作,参加培训、宣传抗战到参加游击战争,还编写过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1939年,范文澜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到延安,参与领导了延安边区的文化建设。他接受中共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开山大师,令人尊重。范文澜的一生,在老辈的学术传统传承上,在历史转折中的创新上,两个方面均得其所致,各有著述传世。这是极不容易的。

我想,范文澜之所以能够走通两端,又能善始善终,一生很少被人诟病,除了他为人正直正派,待人对自己都能立其诚以外,还应该有其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修炼于其中,值得后人认真思索。当然这不是编这本《范文澜读本》的任务,一本小册子也无法探根究底弄清这个深奥道理。只是为了编选工作,我藉此机会浏览了《范文澜全集》的第六卷和第十卷,重温《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涉猎到他早期国学著作,还参考了几种有关范文澜的研究著述。读其书思其人,不觉神往,由此生出两点体会,愿意列举出来与读者分享:

其一,人物关系,即社会关系。范文澜出身于绍兴,算是名门大姓,祖上可以追溯到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中国士大夫文化中积极的基因,深深烙印在范文澜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他的人生基本导航。他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所作的几次选择,尤其是抗战期间他在河南的活动中,这方面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童年时期,他亲眼目睹了革命先烈秋瑾的被捕和牺牲;青年时期,他与鲁迅相过从,虽然一度有过误解,但很快觉悟过来,交往如初;北大毕业后,他做过蔡元培先生的秘书,后来两次被捕入狱,都有赖蔡

流连大美山水间

——胡竹峰《南游记》读后

■ 胡春晖

然处人古人神。人生快意事,问道名山大川,心凝形释,融于自然,与万物合,有天有地有古有今有我,无天无地无古无今无我。

作者好古,访古谈古,海南各地风土人情尽入书中,使这些千百年的民风民俗得以依托文字传承下去;《椰田古寨》《石屿》中,都有此类记叙。在明代万历年间建造的水会守御所,作者发思古之幽情,真正是逝者如斯夫!在鸭公岛坐船,海浪汹涌,作者感叹道:这人世间人来人往,真真假假,不晓得究竟。真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热爱、顺应,时时流出笔端:在什寒村,雨后挂寒小村幽幽像梦,溪流涨水了,木瓜挂满雨滴,紫荆花开得正好,经过一夜风雨,满地花瓣,像伫立一庭的蝴蝶,几头黄牛在草丛里各自安详,吃草安详,张望安详,蹭痒安详,甩尾安详,目光安详,看得人心里安详。只有敬畏、热爱、顺应、尊重大自然,才能做到天蓝水绿,海晏河清,山青鸟鸣鱼畅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游海南,说海南,一定绕不开“我本儋耳人”的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车过儋州》中,写了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情仇,是非非,二人互为密友,性情相投;为同窗,同饮共坐;为政敌,不相为谋。苏轼包容、乐观、旷达,处变不惊,此心安处是吾乡,性情在文中尽情显现。邻家小儿读书声,路边村犬的乱叫,口吹从叶的儿童、立春时节的春牛春杖,都让苏轼欣喜,随处可见生活之乐,鲜见颓丧。儋州人是真爱苏东坡,至今当地有东坡书院、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还有“东坡话”,可谓处处知东坡,处处见东坡。

游历于大自然,作者“双目皆古人所见亦后世所见,人间更替无休无止,风景不变”,文字大开大合,镜头远近交替,由近及远,时空穿越到宋朝时代,阡陌田野、街衢、商贾,此时此地的古时模样再现,“古人和后来者同处一地”。行万里路后的所思所感,融合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情感,放下心头的纷纷扰扰,是非非、恩恩怨怨、疙疙瘩瘩,找到一片澄澈的心灵空间,使人宁静,使人清静。

对胡竹峰其人其文,出版家钟叔河说:“他不拘格式作文,有自己的感觉。夸张一点说,可谓才气纵横……我常说,好文学不好好文章,好文章不必为好文学。胡君能‘双好具、二难并’,实在不易。我又说过,文章不一定都得有意义。从他的作品看,盖是能识得此第一义者,这就更加难得了。”诗人车前子说:“所写皆为海南风物,一位作家给一个地方特意、专门写本书,此地幸事。读了胡竹峰游记,我都不想去那里旅行,为什么?虽说江山大美,其实文字大美,真去哪里,未必如此……不是想着到此一游,而是叹为观止后的梦游与神游。”与有同感焉。

作者在读了《徐霞客游记》后说:“文章有山石的嶙峋,也有流水的清幽,通了汉唐风骨,也可谓之无韵离骚,诗家绝唱。”以这段文字评价这本书所录“可记之事、可感之情、可发之叹、可议之论”的《南游记》,我想也是恰如其分的吧。

三味书屋



《南游记》胡竹峰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古人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山水游记就是行万里路的结晶,通过山川胜景和自然景物描写来抒发游性和心灵感悟。《围炉夜话》中云“观晚霞,悟其明丽;观白云,悟其舒卷;观山岳,悟其灵奇;观江湖,悟其浩瀚”。茅盾新人奖得主胡竹峰《南游记》就是一本山水游记,分“陆离”“南溟”“黎歌”三卷,作者行走于海南的山山水水,读着《水浒传》,读着李商隐、读着梁启超,书写的,既有博物,也有志抒情。作者说:人生快意事,读书晤先贤而登明堂,悦